

# 楚辞浅论

郑文著

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

# 楚辞浅论

魏文

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

一九八一年

# 自序

余少而好赋，曾赋《陪都》，既而“复员”，又赋《还都》，前者拟迹班张，后则步踪潘岳，而循声逐貌，就地抒情，词意所祖，实在灵均。于今反省，妄何加焉。蛻第电扫，宇内光熙，欣斯解放，献我绵薄；探篇章之义蕴，究屈氏之行藏，诂字句之迷蒙，辨著作之真伪。日就月将，冀成裘而集腋，狂风骤雨，遂中道而废攻。老将至矣，体力尚健，目疾日遁，失明堪虑。因将积稿，汇为一集，颜曰《楚辞浅论》，以作教学参考之用。

郑文

于西北师范学院

一九八〇年八月一日

# 目 录

|                                 |       |
|---------------------------------|-------|
| 读《〈屈原列传〉新探》兼论《离骚》<br>的创作时间····· | (1)   |
| 驳《〈九歌〉作于汉代诸证》·····              | (17)  |
| 《九章章句》异议·····                   | (48)  |
| 驳《大招》为屈原自招说并就正于陈子展先生·····       | (63)  |
| 读《惜誓》·····                      | (83)  |
| 读《七谏》·····                      | (88)  |
| 《楚辞·哀时命》试论·····                 | (107) |
| 《楚辞·九怀》试探·····                  | (121) |
| 《楚辞·九叹》意说·····                  | (134) |
| 《楚辞·九思》旧注补正·····                | (146) |

## 读《〈屈原列传〉新探》兼论 《离骚》的创作时间

《文史》第一辑载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新探》一文，认为：“就今本《屈原列传》而言，由‘《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由‘虽放流……’到‘……岂足福哉’这两段文字，都是后人割取《离骚传》语彙入本传者。”不但见解卓越，抑且论证充实。

我同意汤先生的意见，这两段都是后人彙入的，不过，我认为彙入之处，略和汤先生的看法不同。

一、我认为：《屈原列传》“自王怒而疏屈平”以下，紧接“屈平既绌”。自“屈原疾王听之不聪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都是后人彙入的《离骚传》的话。

二、我认为：自“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到“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是《屈原列传》的原文，而自“人君无愚智贤不肖”到“岂足福哉”，才又是后人彙入《离骚传》的话。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屈原既嫉之”，是与上文“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为并列式，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它必须联结下文“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才成为一个神完气足的句子。“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则是说明他创作《离骚》时的心情。

事实与希望相违，所以文笔一转，而说“然终无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此下由“人君无愚智贤不肖”到“岂足福哉”，这一段文字承接上文“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刚刚做到恰好的结合。如果以“虽放流”到“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在“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和“人君无愚智贤不肖”中间，则“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一句，不但孤悬无着，后继乏文，而且语气不全，有待补充。

自“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到“此不知人之祸也”，正从上文“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引出的议论并寄慨于怀王之所以失败；而刘安《离骚传》之所以不用“人君无愚智贤不肖”上接“可谓穷矣”，则由于上文“可谓穷矣”之下，他要论赞屈原为什么创作《离骚》，因而用“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紧接“可谓穷矣”作为过渡。如果“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下接“虽放流”云云，固不免文意不顺，而且下文仅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与“虽放流”的“放流”也不合。所以，我认为：自“屈平既嫉之”到“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仍然是司马迁《屈原列传》的文字。

这样一来，屈原创作《离骚》，自然在“放流”之后了。

汤先生认为游国恩先生在《楚辞概论》中所举的下列三句：

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

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

“不仅不能证明《离骚》是晚年的作品，相反地更足以证明它是壮年的作品。因为从这三句的语气看，凡两言‘将’，则所谓‘零落’，‘迟暮’，‘老’，显指将来而言，非指现在而言；凡三言‘恐’，则分明是恐老之将至，而非言老之已至。”汤先生另外又举出三个句子，即：

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

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

及余饰之方壮兮，周流观乎上下。

“证明《离骚》作于壮年而非作于晚年”。

汤先生所列游氏所举的三个句子的语气，虽指将来而言，但毕竟不是“三十曰壮”者所应有的语气，由此而认为《离骚》作于壮年，理由未免尚不充分。至于汤先生自己所举三个句子，我有下列的看法。

考《离骚》“及荣华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诒”的前面二句是：“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合这四句看来，“荣华”正指前句的“琼枝”。由于它还没有衰落，因而他想折来赠给“下女”，并不是屈原自谓“荣华”“未落”，而想及时把自己赠给“下女”。“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的后二句是：“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这四句都是巫咸向屈原说的。它的意思是说：屈原不但还没有老，而且时间很多，正好及时施展才学，建立事业；否则被群小抢先执政，那就困难了。这正是从上文“勉升降以上下兮，求渠鑊之所同”的意思中进一步敦促屈原迁就环境，合光同尘，而不是屈原说自己年事尚轻，来日方长。至于“及余饰之方壮

兮，周流观乎上下”，洪兴祖补注：“‘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所谓‘余饰之方壮’也。”马茂元先生说：“‘壮’即前‘不抚壮而弃秽兮’的‘壮’。

‘余饰方壮’与前‘佩缤纷其繁饰兮’意同。”<sup>1</sup>他们的解说，和上二句“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以求女”正好切合。因“方壮”就“余饰”言，不是就“余”言，亦即与上句的“和调度”同指屈原自己身上所佩的玉器而言，而不是就屈原而言。由此可见，汤先生解释这几个句子是屈原自谓的语气，是值得考虑的。

考司马迁叙上官大夫进谗，只以屈原“伐其功”。这虽然是他的缺点（如果真如上官所言的话），但不是他犯了罪过。所以怀王也仅仅疏远他。下文叙怀王被张仪所欺，明白指出：“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也仅仅说屈原“既疏，不复在位”，而且还担任外交官出使当时富足而能与秦、楚争雄的齐国。《楚世家》记载这一段史实与《屈原列传》相同。《张仪列传》虽言怀王不听屈原的话，“卒许张仪与秦亲”，但屈原这时居可言之地，三篇记载都是一致的。由此可见：怀王十八年（公元前三一一年，这时屈原四十二岁）<sup>2</sup>，屈原虽然不复在执政之位，仍然留在朝廷，谏言有时也被采纳。因此，《离骚》中所表现的激昂而愤懑的情绪，和他这时所处的地位不称。这是一。

又考怀王十一年（公元前三一八年，屈原三十五岁）楚与齐、三晋虽曾“击秦不胜”<sup>3</sup>，但怀王这时身为从长，在国际上是很有地位的。《九章·惜往日》说：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  
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  
臣而日嬉。

司马迁所谓“王甚任之”，大致就指的这个时候。自从怀王十六年（公元前三一三年，屈原四十岁）起，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由这些史实联系到《离骚》：“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才有客观实际可言。虽然对“皇舆之败绩”，他只是心怀恐惧，而且居安思危，也是象屈原这样的“贞臣”所应有的态度，但就《离骚》整篇精神看来，这种恐惧和当时楚国的不利处境，是密切联系着的。如果在怀王十六年以前，似乎不易有这样的设想。这是二。

由此可知：怀王为从长击秦时，屈原仅三十五岁；张仪来楚时，屈原也不过四十岁，但他在《离骚》中，一则曰：“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再则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三则曰：“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一个三、四十岁的强壮之年的人，怎会有“迟暮”、“老将至”、“年岁不吾与”之感呢？除非他身患特别严重的疾病。这是三。

屈原在没有被疏以前，“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而且“秘密事之载心兮，虽过失犹弗治”<sup>4</sup>，到了被疏之后，“怀王贪而信张仪”，改变了合齐的外交政策。怀王二十年（公元前三〇九年，屈原四十四岁）虽曾合齐以善韩，二十四年（公元前三〇五年，屈原四十八岁），又倍齐而合秦。楚国外交路线摇

摆于齐、秦之间，固然是当时国际关系复杂而多变的反映，也是楚国内部矛盾尖锐而频繁的反映。《离骚》说：

“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联系上述史实，才有它的具体内容。如果屈原仅仅由于“伐其功”的缺点而被疏，而且自己还留在朝廷，谏言有时也被采纳，便“伤灵修之数化”，竟至“不难夫离别”，是说不过去的。只有在他遭受放流之后，也只有在他被疏、被放几经挫折之后，才可能发出这样的抱怨与感伤之言。这是四。

《离骚》说：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  
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  
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

这里的香草，是用来象征屈原所培养的后辈的。这些被培养的后辈，有的因枯萎而绝灭了，有的因荒芜而汙秽了，则屈原自己决不是青年。这是五。

《离骚》说：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  
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顼领亦何伤？

这是屈原感到“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之后，认为自己应须修身洁行，坚持操守，虽然由于饥饿而致面色枯黄，也在所不计。著一“长”字，可见屈原生活的困苦，已经不是短短的时间了。如果这发生在屈原的早年，是不合乎实际的。这是六。

如上所述，屈原没有被疏以前，“王甚任之”，而且法度修明，国家富强，那么被疏之后，怀王虽有变化，屈

原何至就“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尤其在此句中著一“终”字，含有他向怀王曾经过多少次的表白而最后仍然得不到谅解的内容。这和《屈原列传》的“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的“卒”字与“终”字，恰好吻合。照司马迁的记载，屈原的被疏，由于上官大夫捏造他的“伐其功”，而进谗者也仅仅是上官大夫一人。自然史家可以特举重点以概其余，但就“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看来，他竟成了众矢之的。如由灵修浩荡、民生多艰、朝谄夕替、九死不悔、时俗工巧、违法乱纪看来，楚国的朝政当时已经腐败、混乱到了怎样地步！这哪里是屈原刚被疏远以后的情况？这是七。

屈原的被疏，由于上官大夫攘夺宪令的草稿未遂。宪令草稿的具体内容虽不可知，但它会涉及到国计民生，则是肯定的。但如上述，在屈原“受命诏以昭时”的时候，“国富强而法立”，而在被疏之后，便“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情况的转变，未免突然。自然，当他被信之时，不能说民生没有艰困，但“艰”而至于“多”，那么在时间上就值得考虑了。这是八。

女嬃申申詈戒屈原的，一是藉“蜷婞直以忘身兮，终然殒乎羽之野”，以明方正之不容；一是坚持孤高，得不到别人的了解，以明立异的失败。把这些和司马迁所言的宋玉、唐勒、景差“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的“直谏”联系起来，都可见怀王的举措乖方、屈原的性情刚直；也可见屈原和他的政敌斗争，多么激烈！就当时的楚国说，他所进谏的，一是外交政策，一是改革内政。前者必须在张仪来楚之后，后者必须在他所培植的后辈

“变化”之后，才能表现出来。从女嬃所说的“薜荔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看来，正可体会到群芳“萎绝”、“芜秽”之后，屈原如何孤独的处境。如果《离骚》创作于屈原初疏的时候，未免不可理解。这是九。

《离骚》云：

时缤纷其变易兮，又何可以淹留！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这几句谓时事人心，都变化得很快，而且越来越坏。似不是张仪来楚之前所应有的情况。“昔”与“今”对举，而以惊疑与叹息的语气出之，更显得变化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联系到前引的“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几句，可见这里所说的“昔”与“今”之间的时间距离不是很短的。正由时间长了，变化大了，因而才不得不想迅速离开而发出“又何可以淹留”来。这是十。

灵氛劝屈原以“勉远逝而无狐疑”，并且诘问他“尔何怀乎故宇”？巫咸告诉他“勉升降而上下兮，求渠嫫之所同”，甚至提出“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这固然是作者假设人言，以便通过分析去留的问题来抒写他沉痛而复杂的矛盾；后段选择吉日，遘道昆仑，也是作者运用神游，以便通过幻想远逝的历程来发散他沉重而抑郁的幽思。虽然当他“睨临夫旧乡”的时候，“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然而这种“睨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sup>5</sup>的想法，如果不在他遭受巨大的打击之后，是不能有这样的矛盾心情的反映的。这是十一。

末段的乱辞，表示他对楚国、对自己的前途都已绝望了。这种绝望的思想感情，只有他经过激烈而多次的、内在和外在的斗争以后，才会表现出来，倘若《离骚》是他被疏时候的作品，它和他的具体情况是不合的。这是十二。

根据以上理由，我认为《离骚》不是张仪欺楚之前屈原被疏之时的作品，也就是不是怀王十六年（公元三一三年）屈原四十岁以前的作品。

《离骚》说：

余既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愎兮，谗又欲充夫佩帑。既干进而务入兮，又何芳之能祗？固时俗之流从兮，又孰能无变化？览察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

虽然马茂元先生认为这里的“兰”，就是前文“余既滋兰之九畹兮”的“兰”<sup>①</sup>，而不是影射子兰，也就是这里的“兰”是暗喻屈原早年所培养的而后来“变化”了的晚辈，可是上文由“时缤纷其变易兮”到“莫好修之故也”几句，不但已经表达了他对这些后辈起了“变化”的慨叹，而且已经指出他们起“变化”的原因，似不同于“余以兰为可恃兮”以下几句的专有所指。下文“固时俗之工巧兮”四句，再把“椒兰”和揭车、江离比较，他侧重“椒兰”的意向，是很明白的。正由于此，他既责“椒专佞以慢愎兮”，又斥椒“干进而务入”。《新序·节士》载有“张仪之楚，货楚贵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属，上及令尹子兰、司马子椒，内赂夫人郑袖，共谮屈原”，而《汉书·古今人表》的“中下”等也载有令尹子椒，与子兰并

列，足证这里的“椒”是特有所指的。把这里的“兰”和“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联系起来，正可见屈原这篇《离骚》怎样刺痛了这位“无实而容长”的家伙！因此，我认为“令尹子兰闻之”的“之”字，既指的“屈原既嫉之”这回事，也指的“其存君兴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的“一篇”。这“一篇”就是《离骚》。

但今本《屈原列传》在“王怒而疏屈平”之下，明明的“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然后才叙张仪欺楚之事。为什么在这里又重提“三致意”于“存君兴而欲反复之”的“一篇”《离骚》呢？

我认为司马迁《屈原列传》的原文，在“王怒而疏屈平”以后，承接的是“屈原既讎”。自“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一大段，都是刘安《离骚传》的文字。我们由他用“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的“屈平”来称呼屈原看，汤炳正先生有很好的证明<sup>7</sup>。至于这句以前的今本《屈原列传》所用的“屈平”，我也同意汤先生“皆改原为平”的意见。这样一来，《史记》行文，既无文意扞格之病，也无不合《离骚》内容之处。

既然如此，那么《离骚》是屈原什么时候创作的呢？

考《离骚》中所说的“荃”、“灵修”、“哲王”和“不抚壮而弃秽”的、“悔遁而有他”的、“何离心之可同”的、“不难夫离别”的人，都指的君王，而且所指的君王与《史记》所言的怀王，都是一人。倘使《离骚》作于他的晚年，那么他为什么还十分系心于死已多年的怀王

而不系心于当时在位的襄王呢？倘若以为《离骚》所指的王，是怀王与襄王，或者仅仅指的襄王，这不但和刘安《离骚传》及司马迁《史记》所载的事实不合，抑且与《离骚》的本文不合。主张屈原晚年创作《离骚》的理由，是它中间有“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辞”，“朝发轫于苍梧兮”和“九疑缤其并迎”句子。但这些仅是屈原叙写他当时的幻想，而不是叙写他生活中的事实。倘使将幻想当成事实，那么后文的朝发天津、夕至西极、行流沙、遵赤水、路不周以左转、指西海以为期，是否真的到了这些地方？又前面引的“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也不是对老翁谈话的口吻，更可见《离骚》不是他晚年之作。

既然《离骚》所言的王是怀王，屈原在怀王入秦之前曾谏阻怀王，如前所述屈原和楚人又是那么疾恶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令尹子兰闻之又曾大怒，综合审度，《离骚》之作，应在怀王入秦被留、襄王即位以其弟子兰为令尹之后。

其次，《史记》所言“顷襄王怒而迁之”的“迁之”，是否屈原一生仅有一次放逐呢？“迁”字的意义固然可以解释成为放逐，但上文既有“虽放流”之句，这里自以解成移徙为当。《九章·抽思》云：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好姱佳丽兮，胖独处此异域。既惻独而不群兮，又无良媒在其侧。道卓远而日忘兮，愿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何晦明之若岁。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魂识路之营营。

可见屈原的确曾被放逐于汉北。倘若屈原不被迁移，那么他怎会先居汉北、后到江南？如果他一直留在郢都，那就无所谓“迁”，而《抽思》也就不这样说了。

其次，屈原的被放逐，自然和楚国外交政策的转变有关，但也不仅系于这一方面。倘使仅仅系于这一方面，那么子兰本是主张亲秦路线的，襄王为太子时由秦逃归而为质于齐、并由齐国送归楚国为王，可见他是主张亲齐路线的，为什么他即位之后，就以子兰为令尹呢？昭睢本与张仪勾结<sup>8</sup>，为什么既谏怀王入秦而且积极主张合齐呢？襄王因怀王被留于秦且死于秦之故，自即位（公元前三〇一年，屈原五十二岁）到五年（公元前二九六年，屈原五十七岁），都与秦国对立。直到六年（公元前二九五年，屈原五十八岁）在秦国巨大压力之下，“乃谋与秦平。七年（公元前二九四年，屈原五十九岁），楚迎妇于秦，秦楚复平。”<sup>9</sup>在这秦楚对立的一大段时间里，襄王为什么不用一贯主张联齐的屈原呢？自襄王七年“秦楚复平”以后，十四年（公元前二八五年，屈原六十八岁）与秦会宛，又与秦和亲。次年（公元前二八四年，屈原六十九岁）与秦、三晋、燕共伐齐，取齐淮北之地；十六年（公元前二八三年，屈原七十岁）与秦昭会于鄢，其秋，复与秦王会于穰。为什么十八年（公元前二八一年，屈原七十二岁）因人一说，就转变政策而欲伐秦呢？战国时代，虽然山东各国均以秦为虎狼，知其有并吞六国之野心，但由于彼此之间的利害冲突，各国之间的关系既很复杂而且多变，政策也因而时有更改。外交上的纵横捭阖，那更是势有必至。如果政策一成不变，不但不能应付当前变化倏忽

的形势，抑且难于处理各国之间存在的复杂矛盾。当屈原之时，秦最强，齐最富，楚最大，都有并吞六国统一中国的条件，因而三国之间的关系，特别复杂而多变化。如果我们仅仅根据楚国的外交政策的转变而决定屈原的被放与否，那么襄王初立时，为什么信任主张联秦的子兰而不信任主张联齐的屈原呢？我认为屈原的被放，固然与他坚持联齐政策有关，但似应更加重视他所主张的内政政策与当时楚国贵族的利益直接矛盾。我们知道：在屈原之前，吴起在楚国曾经进行过政治上的改革，遭到了楚国贵族的众怒而被他们射死。那么屈原“哀民生之多艰”，欲使楚王“遵道而得路”，他和那些“偃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者之间的斗争，势必剧烈而繁复。在屈原现存作品中，每每提到他自己的孤独，“党人”、“众女”、“众”对他的攻击以及他为了楚国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的坚决的意志和热烈的感情，都体现了他在内政上曾经与那些贵族进行过激烈的斗争。今本《屈原列传》写他创作《离骚》，也特别强调他对于王听不聪、谗谄蔽明、邪曲害公、方正不容的忧愁幽思，而没有涉及他对于外交政策直接发出的非难与主张。虽然有人根据《九章·悲回风》的“施黄棘之枉策”，认为这是屈原反对怀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04年）与秦昭王盟于黄棘，但《悲回风》是否屈原所作，尚成疑问；即就《悲回风》本文而论，果如所说，与上下文俱不联贯。我认为在怀王留秦、襄王初归之际，楚国在内政政策与外交政策上曾经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屈原被放于汉北，从此他离开了中央政治舞台。于是，他“瞻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